



大逆转 1919

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

〔德〕拉尔夫·乔治·劳埃特 著
陈 艳 译



NLIC2970803485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大逆转 1919

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

〔德〕拉尔夫·乔治·劳埃特 著
陈 艳 译



NLIC2970803486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逆转 1919: 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 / (德) 劳埃特 (Reuth, R. G.) 著; 陈艳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191 - 1

I. 大… II. ①劳… ②陈… III. ①希特勒, A. (1889 ~ 1945)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 16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9253 号

Hitlers Judenhass. Klischee und Wirklichkeit by Ralf Georg Reuth

Copyright © 2009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y arrangement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图字 25 - 2010 - 023 号

大逆转 1919: 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

作 者 [德]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

译 者 陈 艳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5.25 印张 1 插页 16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191 - 1

定 价 28.00 元

如果任何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与历史中或者现代的一些现象作比较的尝试都被视做试图理解那个政权及其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只能保持沉默了。

——弗朗索瓦·傅雷，1998^①

^① 弗朗索瓦·傅雷，艾尔奈斯特·诺尔特：《带着敌意的靠近——20 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信），114 页，慕尼黑，1998。

引言

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说，国家社会主义党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列为19世纪的不仁行为^①。对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而德国人民也同样受到了伤害，因为那是一场假借他们的名义进行的屠杀。德国纳粹令人难以置信地如同流水线作业般消灭了数百万人，奥斯维辛也从此成了恐怖集中营的代名词。因此，这么多年来任何试图解释那段历史的尝试都会受到批判和阻止，到头来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希特勒传》的作者约阿希姆·C·费斯特将这种行为称为“邪恶的排挤”^②，因为如此这般就将希特勒排除在了历史之外。人们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抛诸脑后，即针对每个历史时期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对那段

① 彼得·斯劳特戴克：《愤怒与时代——政治心理学的解读》，72页，法兰克福，2006。

② 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Ⅷ页，柏林/慕尼黑，2002。

历史的深层理解。其中，论述的客观性是必须遵守的。禁忌、国民教育、仪式化只会将历史变成神话和传说，是历史研究的错误方向。“只有一个客观纯粹的、超越道德评价的历史记录才是衡量评价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的基础。”埃克哈德·耶瑟、乌维·巴克斯和莱纳·齐特曼在他们合著的《过往的阴影》^①中如是写道。他们要求将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如同马丁·布洛查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那样^②。这个来自慕尼黑的历史学家曾警告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只是定义为“异常”，看做“德国当代史上的孤立现象”^③，而是应该像对待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去剖析这段历史。如果将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放到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得更加充分。

然而布洛查特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因为如果谁在今时今日去研究那段大屠杀或者是大屠杀前传的话，就会被扣上冷血无情的帽子。他的行为还会被人说成是想为德国减轻对其战争罪行所应负的责任甚至是为德国开脱罪责。但是，这样的观点可能比较符合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想法。他因为1998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前的讲演而被称为“精神纵火犯”。2002年，他曾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一个于柏林举行的关于二战的讨论中一起讨论“民族、爱国主义和民主文化”这个话题。他说，一战战胜国主导的、野蛮的《凡尔赛合约》无疑是希特勒上台和奥斯维辛屠

① 埃克哈德·耶瑟，乌维·巴克斯，莱纳·齐特曼：《过往的阴影——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的动力》，法兰克福/柏林，1992。

② 马丁·布洛查特：《请将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载《水星》，1985（39）。

③ 引自马丁·布洛查特：《后希特勒时代——历史的难题》中的《历史上的孤立现象？彷徨在对希特勒时代的求解和评价中的历史学者》，114页，慕尼黑，1986。

犹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看待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常常以单一的视角——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所有的反犹事例，也包括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不管是威廉二世还是泛德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抑或是德国国防军一战时清点犹太士兵的行为，都被视为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有着决定性的关联。而事实上，犹太人在19世纪末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他们更多地融入了德国社会和主流文化。这些历史事实在单一维度的奥斯维辛视角中被略去，只有帝国中尤其是小市民阶层对犹太人地位提升的不满成为了历史的焦点。而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社会变化的发酵而已，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比如，法军军官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的间谍门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犹太人拥有社会特权的讨论使得激进的反犹主义浮出水面。奥匈帝国也不例外。更不要说沙皇俄国了，那里根本就是欧洲反犹的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犹太人那里一再遭遇血腥屠杀，最后被迫西迁。

越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与历史背景割裂来看，就越是会导致很多历史事实的隐去，就越是会得出德国特殊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越是会如丹尼·约拿·哥德哈根于20世纪90年代时所言^①，认定德意志是“凶手民族”，认定德国人心甘情愿地当希特勒的杀人工具。哥德哈根没有用历史的眼光而是孤立地去看这一段过往，他甚至都没有考虑到1914年到1923年德国革命重大转折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就断言

^① 丹尼·约拿·哥德哈根：《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德国平民和大屠杀》，柏林，1996。

德国人具有天生的“反犹基因”。就在哥德哈根的书引起轩然大波之时，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著名犹太学者劳尔·希尔伯格和耶胡达·鲍尔力挺这位美国人。他们认为被哥德哈根省略的历史部分从科学的角度看“没有价值”^①。

现在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盛行。人们试图将德国人的历史浓缩到只剩下屠杀犹太人那一段。历史的起伏被就此抹平，所有人为了计谋、决断和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政治人物仿佛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产品或者玩具。希特勒和犹太人大屠杀也是德意志帝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浪潮的高涨，大屠杀使得这种社会情绪达到了高潮，并且需要对其作个了断。

然而，当人们讨论具有反犹世界观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关键词不只是大屠杀定论和以汉斯—乌尔里希·维勒^②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除此之外，20世纪另外一个席卷全球的极权主义思潮——共产主义，同样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汉娜·阿伦特在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③一书中曾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极权主义理

① 罗恩·罗森鲍姆：《诠释希特勒》，535页，慕尼黑，1999。

②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德国社会史（第4卷）：从一战前到两个德国建国（1914—1949）》，慕尼黑，2003。弗赖堡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尔伯特在2008年8月25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曾写道，维勒认为德国道路的特殊性体现在1871年俾斯麦帝国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非对称性的社会结构将一个刚刚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塞进了超前的宪法里……对此观点的论证在第四卷里分析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希特勒为中心时达到高潮……德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与之前的俾斯麦帝国时期如出一辙，完全是基于领袖的个人魅力，原本多元的德国社会变得越发狭窄：一个所谓社会史调查中的弱点。”

③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统治》，慕尼黑，2003。

论是冷战的产物，有评论说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诋毁。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的清算使得反法西斯主义连带反共产主义情绪高涨。这就造成了撰写历史时一方面对共产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的革命行动严重被忽略，另一方面拒绝将这两者相提并论。

记忆犹新的是对历史学家埃尔奈斯特·诺尔特的放逐。诺尔特认为古拉格集中营（苏联）和纳粹集中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即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具有同源性^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被知名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人，把“疯狂与方法论”相结合，拿犹太人与昆虫相比较^②。这种令人愤慨的指责背后是对诺尔特观点

① “历史学家论争”始于埃尔奈斯特·诺尔特 1986 年 6 月 6 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借此机会攻击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淡化大屠杀并且将联邦政府变为右派保守主义的企图。在这些历史学家中除了有埃尔奈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和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之外，还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的顾问米歇尔·施杜默尔。哈贝马斯认为施杜默尔奉行的是一个带有德意志民族色彩的北约哲学。《明镜周刊》的出版人奥格施泰因支持哈贝马斯的观点。很多学者在“历史学家论争”期间纷纷表明自己的观点。约阿希姆·C·费斯特于 1986 年 9 月 6 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着一个普遍现象，即给与历史定论相左的观点扣上法西斯共犯的罪名。而哈贝马斯正是延续了这一传统，将一些知名历史学家都说成是北约派。费斯特支持诺尔特的观点。他并不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罪行的绝无仅有，但是他同时认为这一行径和布尔什维主义有着因果关联。关于“历史学家论争”参见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历史学家论争——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唯一性之历史学争论》，慕尼黑/苏黎世，1987；埃克哈德·耶瑟，乌维·巴克斯，莱纳·齐特曼：《过往的阴影——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的动力》；斯文·菲利克斯·克利尔霍夫：《一种错误——二十年历史学家论争：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如何炮制政府历史学家阴谋论》，载《世界报》，2006-07-11。诺尔特的观点参见斯文·菲利克斯·克利尔霍夫：《欧洲的人民战争（1917—1945）》，慕尼黑，1987。

② 《明镜周刊》，2000-12-04。

实质的忽略。因为诺尔特所指的“因果关系”并非指一种“客观的关系”，而只是在犯有反人类罪的希特勒的那些妄想中得到了印证。

诺尔特用他那绝无仅有的雄辩才能将那些混合着意识形态和情感的论述展现在世人面前。主写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弗朗索瓦·傅雷在《幻想的幻灭》^①一书中写道，诺尔特所做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的最重要的研究^②之一：因为唯一彻底分析20世纪初两大思潮和政治运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就是将两者当做导致自由民主危机的因素放在一起观察……^③

哈佛科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参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有观点影射犹太人组织为了颠覆基督教文明和雅利安文明而创造了共产主义。而这种言论为纳粹提供了彻底清除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基础^④。美国历史学家亨利·L·费恩戈德认为犹太人在欧美领导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形象是反犹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⑤

这些观点也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感知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作家斯蒂法尼·古尔多瓦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⑥将共产党政权的罪行称为“红色屠杀”。

① 弗朗索瓦·傅雷：《幻想的幻灭：20世纪的共产主义》，慕尼黑，1996。

② 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慕尼黑，1963；诺尔特：《欧洲人民战争（1917—1945）》。

③ 弗朗索瓦·傅雷，埃尔奈斯特·诺尔特：《带着敌意的靠近——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50页起。

④ 理查德·派普斯：《犹太人和俄罗斯革命》，载《波兰人》，1999（9）。

⑤ 亨利·L·费恩戈德：《搜寻的年代：进入主流（1920—1945）》，7页，巴尔的摩，1992。

⑥ 斯蒂法尼·古尔多瓦等：《共产主义黑皮书：镇压、罪行、恐怖》，慕尼黑，2004。

黑皮书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苏联重组改革的设计师。他在书中说苏联是一个“名为社会主义的集中营”^①。就此，他和其他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延续了之前的“历史学家论争”。然而这次论争远没有之前的激烈，只有少数的尖锐对立点^②。经济全球化和其带来的社会变化让西方工业国的人们在20世纪的那些灾难面前变得麻木不仁。只有欧洲的屠犹成为了遗忘之海中的“孤岛”，不断地被人们从政治、意识形态、科学、结构主义、情感、国民教育等角度重新解读。

这本书正是按照布洛查特将历史“历史化”的思路去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反犹的根源和实质，将希特勒置于研究的中心。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世界观，他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傅雷认为，“没有他那错投了魔鬼怀抱的政治天赋，历史将被改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容易用宿命论和社会学观点去理解历史，会忽略在欧洲这一悲剧中一些特定人物的作用。”^③

要想了解希特勒极端反犹的思想，必然要阅读关于他的传记。首先要

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苏俄一个世纪的暴力》，57页，柏林，2002。

② 这里指的是沃尔夫冈·卫普曼等左翼东正教历史学家。卫普曼在他和延斯·梅克伦堡合作出版的《“红色屠杀”？——对〈共产主义黑皮书〉的批判》一书中用侮辱性的方式攻击黑皮书的作者，认为他们近乎于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他们认为黑皮书及其支持者意在将左翼阵营非法化和大屠杀相对化。卫普曼和梅克伦堡总结道，诺尔特只是貌似在“历史学家论争”中取得了胜利。

③ 弗朗索瓦·傅雷，埃尔奈斯特·诺尔特：《带着敌意的靠近——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91页。

读的就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恩·克肖^①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卷《希特勒》。《法兰克福汇报》称其为“巨著”，并且尊其为解读希特勒的权威。在此之前，费斯特是希特勒传记的权威^②。费斯特在克肖的这本两千多页的希特勒传记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的勤奋。书中认为希特勒现象是很多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有争议的。虽然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③费斯特把希特勒看成那个时代的恶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希特勒那样将内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惧转变为力量，并且坚持将这股力量注入他的政治生涯。希特勒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他“始终都把那些思想和主义只是当作工具”^④。费斯特给希特勒写的传记彻底取代了阿兰·布洛克^⑤。后者将希特勒阐释为一个虚无主义、毫无原则的弄权政治家。

但是要说到希特勒排犹的根源和实质的话，三位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观点却相当接近。布洛克和费斯特在这个话题上着墨不多。虽然一切都仅仅基于希特勒的自证，但是他们观点的一致性使这个问题有了历史定论。然而费斯特也说过，希特勒一生都在努力掩饰和曲解自己……几乎没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如此流于表面的程式化……^⑥

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继续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

① 伊恩·克肖：《希特勒》，第1/2卷，斯图加特，1998/2000。

② 《法兰克福汇报》，1989-10-06。

③④ 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X、1041页。

⑤ 阿兰·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并行人生》，柏林，1991。除了一些更新之外，其中关于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部分与他在希特勒传记中的观点吻合（阿兰·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研究》，杜塞尔多夫，1953）。

⑥ 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29页。

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 19 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本书就以上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会为读者刻画出一个和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笔下那个反犹分子全然不同的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的魔鬼形象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而只会更加邪恶。

目 录

- 第一章 居然曾是犹太之友 / 1
- 第二章 被隐瞒的真相：“犹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士兵苏维埃成员 / 23
- 第三章 禁忌：激进反犹只因“犹太布尔什维克” / 63
- 第四章 曲折的因果关系：激进反犹是因为“犹太资本主义” / 101
- 第五章 不可思议：阴谋论的理论家 / 130
- 第六章 有争议的结果：从纲领制定者到毁灭世界的恶魔 / 180

第一章 居然曾是犹太之友

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仇恨犹太人。而事实上 1919 年（希特勒时年 30 岁）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说法。唯一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万册的自传——《我的奋斗》。他在自传中自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23 年 11 月 9 日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投入兰茨伯格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这个囚犯身份让希特勒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美化自己行为的好机会，虽然那次暴动策划的水平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暴动失败了，希特勒锒铛入狱。此时的他十分不安，担心就此失去政党的领导权。他的党派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在 1924 年 5 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和一些小党派一起取得了 6.6% 的席位。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出一本书来指导革命。而出书的另一个

目的则如 1925 年 7 月第 1 卷出版时的副标题所示：清算。^①

于是就有了这本真实度极其不高、语言又艰涩的“巨著”，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用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为渲染希特勒世界观之大成服务的。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读者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单是他的出生地布鲁瑙就已经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了。他写道，“那个地方位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德意志的统一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使命。”^② 希特勒在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的他就已经醉心于大德意志国家的理念。而在 1909 年至 1913 年居住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弱小的世界公民转变成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③

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首都维也纳希特勒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犹太人是“芽孢杆菌”，“披着腐烂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还恐怖”。^④ 因为无论是卖淫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我能记住几乎所有那些领导者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大卫、爱伦波根，这些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⑤ 他还说，他已看穿了“那些关于政党目标和意义的错误思想的面纱”。“拨开迷雾就会发现社会民主的字里行间露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微笑的

①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次清算》，慕尼黑，1925。凡引用该书的部分，未特殊注明的均引用自 1939 年出版的版本。

②③④⑤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3、73、66、70 页起。

鬼脸”。^① 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挑战民族和种族的意义，并由此剥离了人类存在的基础”。^②简而言之，希特勒在“维也纳经历痛苦的学徒生涯”时已经看到并总结了“犹太人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

希特勒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而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不管是布洛克、费斯特还是克肖。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为边缘人则完完全全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学生，在难民营里也屡屡受挫，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反犹主义实质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汉式的仇恨无的放矢的一种形式”，“他在犹太人身上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③ 费斯特在他书中写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犹者联盟”，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当时并不存在这个组织。^④

这种观点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因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据点，而维也纳在 20 世纪初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犹主义并存。传统的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看做“谋害上帝之人”；自由主义的反犹主义谴责犹太人的不宽容和与世隔绝；左翼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则对犹太人的颠覆精神感到不安。从 19 世纪末就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以上这些看法或者偏见都

①②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60、73 页。

③ 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64 页。

④ 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70 页。1918 年之前，奥匈帝国内并没有反犹者同盟这个组织。参见布里吉特·哈曼：《希特勒的维也纳：一个独裁者的学徒生涯》，83 页，慕尼黑，1996。